

从大连理工大学的东门向外直走,爬上一段坡,路左侧有一栋红色的小楼,这里既是当地社区的党员活动室,也是大连理工大学南山离退休人员活动室。

刚刚踏入外屋,还未见到人,先听到了京剧段子。这里汇聚着一群热爱京剧艺术的退休教师,大连理工大学教授何熙文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学校京剧社的社长,他已经在高校推广京剧艺术、弘扬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探索了十多年的时间。

大连理工大学京剧社创建于2009年,今年正值创社十周年的日子。在这十年间,一曲抑扬顿挫的古韵京腔,似乎一直伴随着何熙文和他成长中的京剧社。也正是在这声声念白、袅袅余音中,京剧艺术的种子在这所理工科的校园中萌芽、成长……

缘起

接受记者采访的那天,正赶上何熙文和几位退休教师开展活动。琴声一起,嗓子一开,这间稍显陈旧拥挤的活动室瞬间成了最耀眼的京剧舞台。坐在桌前、角落的教师们就是最好的听众、鉴赏家,和着节奏点头摇扇,听到妙处,间或喊上一嗓子:“好!”

这间小屋里的所有人都是被京剧文化紧紧连在一起的。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更多看不见的线,连接着何熙文和他在校园内外的学子们。

这一切的缘起,皆因京剧。

“在我还没有退休时,这间以京剧活动为主的小屋就存在了。”何熙文告诉《中国科学报》,退休后,本来就对京剧艺术有浓厚兴趣的他,在同事、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刘铁牛的邀请下,来到了这里。

当时,正逢大连理工大学筹划大学生素质文化教育,缺少合适的教师,何熙文便结合自身对京剧的了解和兴趣,开始组织一些有关京剧的教学。

“这便是一切的起点了。”何熙文说。

最初,他只是在每学期由学校组织的老教授讲座活动中,断断续续地开展《京剧的魅力》讲座,没想到场场都能够吸引到两三百名学生听讲。这样的讲座,何熙文一讲就是三年,涉及京剧基础知识、鉴赏、表演等大内容,这也成了许多大工学子的京剧启蒙课。

“三年的讲座虽不连续,但至少有几千名学生借此了解了很多京剧知识。”何熙文说。同时,这些讲座经过整理后,在2010年编成了一本京剧教材,在学校支持下出版。

正是以这本书为教材,依托多年的讲座积累,大连理工大学首次开设了《京剧艺术知识与欣赏》选修课,何熙文成为这门课程的主讲者。截至今年,该课程已经开设17期,选修人数达到3500人。

鉴于学生们对于京剧的巨大热情,大连理工大学还在2012年成立了专门针对学生群体的学生京剧团,举办的沙龙、参与的演出,以及获得的奖项不胜枚举。

困难

在大连理工大学,对学生京剧艺术的培养似乎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然而在顺利进行的背后,需要付出的努力、解决的问题和破除的阻碍,只有参与其中



何熙文(右一)和大连理工京剧社的老师们在活动。

一曲京腔十载情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记者 袁一雪 通讯员 柳景超

琴声一起,嗓子一开,这间稍显陈旧拥挤的活动室瞬间成了最耀眼的京剧舞台。坐在桌前、角落的教师们就是最好的听众、鉴赏家,和着节奏点头摇扇,听到妙处,间或喊上一嗓子:“好!”这间小屋里的所有人都是被京剧文化紧紧连在一起的。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更多看不见的线,连接着何熙文和他在校园内外的学子们。

的人才能体会。

采访中,何熙文坦言,开一门选修课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而他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担心课程无人问津。

“在设立京剧选修课之初,学校曾经找我谈过,他们担心这门课程没有学生选,我也不清楚这门课程是否能够吸引足够多的学生。”他回忆说,在两难的境况下,学校党委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时任校党委书记张德祥表示,可以开设京剧选修课程试试看,如果结果不理想再做其他打算。

抱着这种试试看的态度,何熙文的京剧选修课程开讲了。然而,第一期课程的火爆程度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由于场地限制,每门选修课课程名额在200人左右,但第一学期京剧课程就有157名学生选修。

从那时起,京剧选修课就火了

起来。

第二期课程,课程选修人数直接“爆表”,达到了230人左右,直到现在,京剧选修课在大连理工大学都十分抢手,报名人数基本保持在200人以上,更有学生因手速慢抢不到课程,便向何熙文“诉苦”,不得不再等一学期。

课程是设立成功了,但如何讲好这门课程,依然是何熙文这位从计算机跨到京剧的“跨界导师”需要直面的问题。“很多选修京剧课的学生可能并不完全对它感兴趣,甚至大多数从未接触过,如何让这些学生听懂课程,喜欢上京剧,这是一大难点。”

作为把何熙文拉入京剧大家庭的“主推手”,刘铁牛见证了这些年来,何熙文为上好京剧选修课而付出的汗水和心血。

“跨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老师原本是理工科教师,京剧又是一门

难度大、涉及面广的传统艺术,这两者间的跨界难上加难。为上好课程,他做了大量工作,自己重新学习京剧相关专业知识,研究京剧的发祥、历史、流派等,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才走到今天。”刘铁牛回忆道。

经过不断的积累与尝试,何熙文总结出了适用于“京剧小白”的诀窍,那就是京剧作为一门实践性、表演性极强的艺术,课堂上不能只放课件、光靠嘴讲,还要邀请一些京剧名家,到课堂协助演出,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京剧魅力。

于是,何熙文的课堂上,经常会出现一些年轻的京剧演员。他觉得学生和同龄的专业京剧演员之间更容易沟通和理解。

何熙文的想法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这种课堂上零距离接触,让学生们很兴奋和很激动。更有学生上完课后找

到他感叹:“老师,我太惭愧了,过去对于京剧的认识太肤浅了,感觉很震撼。”这种对心灵的震撼正是传统文化魅力所在。

“引导学生入门并不容易,需要大海捞针,捞到京剧中最精华的部分,此后再深入引导,将中国传统艺术的美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何熙文总结道。

星火

“站在大工京剧社成立十周年的节点上回过头来看,可以说,我们在高校中推广这项传统文化的尝试是成功的,更是值得的。”何熙文感叹道。据介绍,许多学生在课后对京剧产生了浓厚兴趣,有的还加入了学校的学生京剧团,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京剧之路上走得更远。

比如在2019年上学期,共有超过190人选修京剧课程,其中就有6名同学加入学生京剧团,这也使得京剧社每年都能够吸收新鲜的血液。

通过选修课程和参加社团,有些学生已经可以进入业余京剧票友行列,从对京剧一无所知的小白,摇身一变成为京剧舞台上的角儿。更多的学生通过课程学习,也成为京剧的欣赏者,甚至评论家。

何熙文放不下京剧、放不下他带过的每一批选修京剧课程的学生,因京剧结下的缘从未中断。他教授的学生中,有些进入了其他高校成为教师、辅导员,在他们扎根的学校继续从事着京剧的推广和传承工作,将这门传统文化的火种带入到更多高校和行业中。

谈及自己的得意弟子,何熙文显得十分欣慰:“我跟踪过很多优秀的京剧学生。他们当中,有的将工作单位的京剧活动组织起来,办得有声有色;有的成为创作者,编写了不少好的京剧剧本。从京剧小白,到京剧名角,再到京剧传播使者,这就是京剧的魅力,是京剧中优秀文化对于人的成长的促进作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这样一个个成长起来的小火源,在全国各地和各行各业点燃了京剧的火种。

“对于京剧的发展很乐观,因为全世界喜欢京剧的人比过去多得多。不断有新鲜血液注入进来。京剧不再只是老年人的爱好,也不再只是专业者的事业。”何熙文分析道。

京剧大师梅兰芳曾经说过,京剧需要“移步不换形”。这五个字说来简单,要做到却并不容易,包含了改革与创新、固守与坚持、推广与演绎等,其中有很多在具体的做法上依然很模糊,仍待商榷。

在这方面,何熙文十分看好高校的阵地。在他看来,让戏曲进校园的意义深远。因为京剧的美独树一帜,是具有深厚民族基因的,对于它的学习和传播,正是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是高校育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大连理工大学已经入选教育部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学校非常重视文化育人工作,已从基础设施、师资力量等多方面入手加强建设,努力推动京剧艺术的普及和推广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正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像何熙文和他的学生这样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与京剧结缘的师生们必将点燃更多的星星之火,让京剧之光照亮世界。

史海钩沉



西北大学北校区大礼堂

来到西北大学,有一处“景点”几乎是每个参观者都要前往的,那就是位于学校的大礼堂。然而,单就外形而言,相较于北校区的其他建筑,如图书馆、科研楼、博物馆……大礼堂冠之以“大”,实在是有些勉强——大礼堂仅仅只有一层,白白的外墙、圆形的屋顶,加之周围几棵绿树的掩映,的确很有些“不起眼”。

但是,西大人却从不单单称其为“礼堂”,偏偏要在前边冠以“大”字,这又是什么呢?

大礼堂之“大”,首先在于它的资格老。西北大学现存的校园建筑中,大礼堂是年代最久远的。从上世纪30年代至今,大礼堂历经了近90年的风雨,是学校发展变迁当之无愧的见证者。

此外,大礼堂之“大”还在于它的来头大——它的首倡建设者便是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认为,“国家大事,当从事于教育一途”。在他担任东北大学校长时,就曾倾家财扩建东北大学,连张夫人于凤至都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为东北大学创办了家政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内迁,先至北平,后随张学良入陕迁到西安。到达西安后的东北大学就落脚在现在的西北大学校园,大礼堂就是在那时建造的。张学良还为东北大学校舍奠基仪式题词:“沈阳设校,始经维艰。自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勸尔多士,复我河山。”现在大礼堂的门前,还能看到刻有少帅题词的石碑。

当时的张学良被世人骂为“不抵抗将军”,入陕“剿共”又连连受挫,不仅归乡无望,反陷于连绵内战。正当其时,面对有家不能归的东北大学师生,张学良心中的悲苦和愤懑、对学子学成报国的殷殷之情,都流泻在这短短的几句题词中。

1936年,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逼其联共抗日。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身陷囹圄,东北大学也迁离西安。东北大学西安校址遂被胡宗南的部队占领,称为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蒋介石携宋美龄曾在这座大礼堂中给军官训话,少帅题词的纪念碑则被军官们挖出来当饭桌用。后来,胡宗南听说有人在背诵张学良的题词,不禁大怒,将石碑砸毁。多亏当时刻碑的白姓石匠冒着风险保存了原碑的拓片,才使得这一珍贵的题词在半个多世纪后得以重见天日。

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学和八百里秦川上的西北大学相隔千里,两校历史却因世事更迭与演变在这座大礼堂里重逢。当年,大礼堂一定不止一次地目睹了少帅勃发的英姿,聆听过少帅带有东北口音的演讲。不知道少帅在作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之时,是否在这里徘徊过?也许,在他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前,来这里向他最关心的东北大学师生们告过别吧。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这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写于台湾的诗句。而大陆的这一段,西北大学大礼堂也曾经和西北大学的故知新人,期盼着昔日的少帅在有生之年能故地重游。

斯人已逝,空留下无限追思。碑刻仍存,述说着曾经的故事。少帅在西安完成了他人一生中最后一笔,大礼堂穿过岁月沧桑,成就了自身的一段传奇。

新中国成立后,大礼堂仍默默继续着自己的使命。半个多世纪以来,大礼堂见证了有关学校发展大计制定和通过,感受着无数青年学子的青春热情和活力。在这里,表彰过优秀先进,也产生过校园歌星。在这里,李泽厚讲过美学,李德伦指挥过交响乐;大礼堂演绎过崔健的《一无所有》,也回荡过盛中国凄美的《梁祝》。直到现在,西北大学有什么重要的会议、活动,最理想的地点还是大礼堂……

半圆形的屋顶、高而狭的窗户;门口是四根圆柱支撑着一个向外伸出的风雨厅。大礼堂周身没有绚丽的色彩、繁杂的线条、精美的雕花,它古朴、凝重、苍凉。西大人始终精心保留着大礼堂的原貌,唯一的改动是解放后在礼堂的正门墙上镶嵌了一颗红星。现在这颗红星也和它承载的历史一起沉淀在了大礼堂的记忆中。为了使大礼堂与周围的环境和谐,学校还特意保留了在礼堂周围、与礼堂同时期修建的几排平房,使它们形成一个旧时代建筑的群落。

没有高大的现代化建筑在近旁苦苦相逼,大礼堂在绿树掩映下显得格外沉静和悠闲。

(作者系西北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少帅的礼堂

熊晓芬

我为什么要画李德威

■黄瑛

记得当初刚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以下简称地大)时,觉得很不适应,一方面是因为校园环境,方方正正、规矩矩矩,建筑和道路只有垂直线和水平线,不似人文艺术院校那般柔软温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项规章制度,似乎在时刻提醒我,艺术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直到工作十几年后的今年,我才开始真正爱上Ta。好比旧式办办婚姻中的一对男女,未经自由恋爱的过程就生活在一起,相敬如宾。经过各种细微磨合与漫长平凡的生活后,彼此之间慢慢地产生了爱情。这种后知后觉的爱更为醇厚。

长期以来,不论是我的生活还是学习,始终都与文艺发生着关联。而艺术和科学这两条平行线,似乎永远不能交叉,这曾是我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这种观念第一次发生转变,是当年我出国留学前,在川大接受培训的时候。

那时,全班五十多个同学,来自不同高校、研究所,绝大多数是理工科专业,自动化、计算机、航空、医学、地质学……人文社科屈指可数。大约只有三四人。但在每天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中,我忽然发现,有些同学(包括其中爱好艺术的同学)理解艺术的出发点与从事本专业的同行截然不同,和往常听到的见解也大不一样,颇有意思。

不同于艺术零散片段、感性跳跃的思维方式,理工学科要求思考、处理问题具有较强的逻辑性。从他们的角度,看到的世界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不论艺术或者科学,都是观察、理解、探索和表达世界的一种方式,科学推动社会的进步,关乎物质,文艺感化人的心灵,关乎精神。

大众审美与当代艺术史的发展,二者之间有着较大的距离,艺术不应仅仅是圈子内的自娱自乐。

著名美术批评家鲁虹老师的专著《中国当代艺术史》出版后,我曾仔细研读,觉得这样一部高水准的专业著作,应该大力推广,让更多人受益。抛开职称考评等现实问题,在有余力的情形下,我可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于是在2018和2019年春季,我申请开设了全校通识课《中国当代艺术史》。选修的学生来自各个学院,这也是我第一次独立给理工科学生讲当代艺术史。

在授课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学生理解力强,对事物的分析客观且不落俗套,有自己的观点;观展后的全班交流环节,有的同学像做科技汇报一样严谨认真,有论有据;对老师非常尊重,如不能按时到课,会按要求写好请假条,不用老师追问原因,在他们看来看不到一点浮夸与张扬。如果让其其中一些有天赋的同学来从事艺

术,可能会改写一部分中国当代艺术史。这些优秀的学生,“艰苦朴素,求真务实”,是地大精神的传递者。毫不夸张地说,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这所学校的可敬、可爱。

有了这样一种转变,这样一种由衷的“爱”,当了解到构造地质学家李德威教授科研和工作的情况时,我便产生了用绘画进行表达的强烈愿望。25年时间里,李德威教授在青藏高原从事地质科考,行程8万里,把论文写在地球上。他敢于攀登地学高峰,利用地质新理论新方法,探索新资源,助力中国南方打出第一口干热岩井,为我国新能源开发和利用探索出一条新思路。长期的教学与科研,拖垮了他的身体。在生命弥留之际,他用颤抖的手写下“开发固热能、中国能崛起”。2018年9月14日,李德威教授因病在武汉逝世。他建功立业新时代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为了弘扬知识分子建功立业新时代的精神,这幅作品采取三联画的形式,着重刻画李德威教授在青藏高原进行地质科考与海南开发固热能源的两个工作场景,中幅着重表现各层级部门对他的认可、宣传与推广。山形、花叶、云朵为一条连贯的曲线,共同构成画面上部的边界,类似于山脉的造型,象征着中华民族精神像高



再有一个月,就到了我国知名构造地质学家、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李德威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一年前,这位研究青藏高原近30年,足迹几乎踏遍了高原每一寸土地的科研赤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在他挚爱的科研事业拼搏着。

就在几天前,与李德威来自同一所学校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黄瑛,以三联画的方式,专门为李德威教授“画像”,并取名为《开发固热能 中国能崛起》。

山一样巍然屹立。

从注重个人体验与表达,强调作品个性化特征,到尝试塑造新时代地学楷模,看似不相关联的两种题材,是由“小我”到“大我”的转变。艺术作为个人情感的表现手段,离不开社会生活这个宏大的背景。这幅作品尚不成熟,与以往的创作题材和风格有较大差异。新题材的尝试还需要多方磨练,才能寻找到最为适宜的表现方法。

(作者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